

土改：一场“革命的戏剧”

选自 R·L·戴维斯 著：

《红色幽默与黑色幽默——人民中国史》



观察中文网

www.guancha.org
www.observechina.net
www.observechina.com

观察英文网

www.cicus.org



革命的戏剧

革命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加以解读。

砸碎的土地界标，烧毁的田契，崭新的衣裳，还有胆怯却高举皮鞭的手，对于中国的农民来说，革命的含义几乎尽至于此，别的内容，例如理论的教育，恐怕只是对其的小小的点缀，实利主义在中国深入人心。

像所有的革命一样，革命的含义是以后赋予的，革命的动机对于群体来说，是基于共同利益的追求，而对于个人来说，则是希冀在革命的果实中能够分的属于自己的小小的一部分，在革命过程中来看待革命，革命本身就无可奈何地陷入了庸俗的泥淖。

这也许可以解释如何将缺乏革命精神的中国农民改造成中国革命的基础，作为革命动机的仇恨与革命胜利后的成果分配的许诺成为了农民参加革命的最主要动机。

早在两千年以前，中国的农民就有使用宗教的方式来促使自己参加各种各样的运动（大多数是指中国的农民战争）的传统，这一传统大约有两千年的历史*，其作用是能够增强参与者的信心，告诉他们这一切符合上天和神灵的旨意，而上天和神灵会保佑他们能够平安的完成运动并取得胜利，作为革命的早期领导者，毛泽东和他的同志对此十分熟悉并重视，具有朴实的乡土气息的毛首先是农民的儿子，他深信自己了解农民，并且相信这一传统可以用于革命的目的，尽管毛的革命排斥宗教，但他相信，农民的宗教情绪与革命的结合将像是戴手套一样的轻而易举。

信仰的动机用仇恨代替，宗教的内容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启示录里的“再没有痛苦，也没有悲伤”的“新天新地”就是共产主义的乐园，而“末日审判”就是指对地主的批斗。

这个新宗教还需要一个新的神，他可以以怜悯的态度倾听人们的请求，满足他们的愿望，施舍给他们同情。

一位农民兴高采烈的说：“是毛主席给我们土地的！”



土改中分得了棉衣的农民

*例如，在中国的第一个帝国秦灭亡的最后几年，一个类似预言似的流言在帝国的北部悄悄地散布，这个直白的预言告诉农民将有一个叫做陈胜的人取代秦帝国而成为皇帝，并且建立一个叫做“楚”的国家，而这一预言都是由一种普遍认为有灵性的动物：会说人话的狐狸做出，人们大多相信了这一后来被证明是假造的预言，跟从了预言中所提到的陈胜，而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陈胜许诺在他的新国家建立以后，每个人都可以分享这个新国家的财富。而在中国帝国时代最后的五十年中，两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都是基于宗教，一个自称上帝之子的落魄书生洪秀全以自己在昏睡中所发出的“杀灭魔鬼”的呓语作为旗号而与政府进行武装对抗，他一面带领他的军队攻城略地一面宣扬自己的宗教，将所有不信他所创宗教的人统统杀死，后来，这位上帝之子沉溺于自己所创造的宗教和浮华的宫廷生活不能自拔，并在一系列拜占庭式的宫廷政变中削弱了自己的实力，最终被政府的军队包围而活活饿死。另一次农民的运动则是缺乏一个统一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一次集体的狂热排外运动，一种民间武术被神化，所有练习这种武术的人都自认为可以刀枪不入，同时所发生的中国北方的干旱天气增强了人们的狂热心理，政府借机将祸水引向早已令帝国仇恨的洋人，闹剧的开始和结束同样迅速，最终的结果是帝国的首都北京被攻陷，而政府被迫流亡西安，直到答应了西方国家所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苛刻的条件才得以返回京城。

宗教本身如果没有各种各样加尔文或本尼迪克式的清规戒律加以约束时，是很难不陷入狂热的迷信的，而在中国，清规戒律本身是秩序的一部分，而非新兴的革命的一部分。革命本身就带有非秩序性，中国这个被各种各样的戒律和教条的束缚的国度有太多的东西需要被破坏。



白毛女的连环画

**戏剧作为一种人民运动的武器而被广泛的使用，并且常常得到出乎意料的收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著名的小说《西行漫记》中提到：“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红军占领一个地方以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民的疑虑，使他们对红军纲领有个基本的了解，大量传播革命思想，争取人民的信任。”

然而在这个乡村的国度里，打破这种秩序就像是一只蝴蝶想要挣脱开粘稠的蜘蛛网一样，中国的农民使用几百年前祖先使用的镰刀与锄头，在炎热的太阳下，从黄色、褐色或黑色的土壤里寻找属于他们的生活，一个中国农民的生活显得单调窒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天两顿饭，其中的一顿是在田埂边进餐，同时，浓重的土腥味可以当作下粥的小菜，从出生到死亡，循环永无休止，像钟摆一样准确。

打开锁链的唯一方法是寻找它们的漏洞，在农民简单的生活中，同样简单的娱乐活动也必不可少。

戏剧是这些农民最为喜爱的一种娱乐方式，舞台上的理想化的生活给人以感官上的享受，一部好的戏剧会让人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他们会随着舞台上情节的变化而时或泪流满面，时或哈哈大笑。

就像中世纪的时候，观看神迹剧的观众会因为耶稣钉上十字架而泪流满面，中国的农民大多数是文盲，就像欧洲中世纪的农民一样，长篇大论的文章和哲学典籍只会使他们哈欠连天，而庸俗简单的乡村戏剧所起到的效果会胜过乔叟的百篇诗歌。

当观众们深深的沉溺于作为革命的宣传工具的戏剧中时，一种类似宗教情感的热情就油然而生，一位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人员在看到农民们大声辱骂舞台上的白匪地主，而对深受迫害的贫苦农民施以同期的热泪时，这名宣传人员就知道他和他的同志所导演的戏剧已经深深地打动了农民，剧情起到了宣传的效果令人兴奋。**

影响最大的是一部叫做《白毛女》的五幕话剧，后来改编成为中国的传统剧目而加以推广，这个悲惨的故事讲述了一个佃农和他的女儿的遭遇，像中国所有传统戏剧一样，一个有钱乡绅黄世仁看中了一个贫苦的佃农之女，并且利用卑

劣的手段迫使这个佃农自杀并抢占了他的女儿，在这名不幸的女子被反复虐待和奸污后，她选择了出逃，而她真正的心上人却参加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度过了漫长的三年后，共产党的军队到来并惩治了这个狡诈恶毒的乡绅，解救了这个已经满头白发的少女。

这部著名的戏剧感动了无数朴实的农民，几乎中国的每一个农民都可以从中找到他们自己过去生活的印记，而这个戏剧最终圆满而美好的结局证明了一点，中国共产党建立起来的新社会“将鬼变成了人”。

戏剧表现出来的生活理想化，但是作为革命的工具，所激发出来的情感却十分真实，毋庸置疑，受到表演感染的农民会激起热情，人类善于模仿的原始天性被激发出来，观众像戏中的人物一样发泄对他们认为是戏中人物的现实中的人的仇恨与不满，这种感情很容易被引导，走向中国共产党所希望的革命的道路。

“他穿着这么鲜亮的衣服”，一位年轻的农会女干部将她的头向后仰，用下巴点着旁边那个肥胖臃肿而瑟瑟发抖的乡绅，这位倒运的乡绅头埋得如此之低，以至于那些衣衫褴褛的旁观者甚至看不清他的脸。

“这都是你们的血汗做成的！”尖利的声音又一次响起来，并且压过了底下断断续续的抽泣声。

然后，这位女审判者开始将这只灰头土脸的鸵鸟的头压的更低，以至于他的双层下巴已经碰到了他的肋骨，然后，她喊过来一名花白头发的老年妇女，命令这位颤巍巍的老人打这位倒楣的乡绅一记耳光，在这位老太太非常牵强的完成了要求后，她被告知不应当这样心慈手软。

不过，这已经开了一个好头，人们不再满足于高高地举起握紧的拳头而是义愤填膺的扇他的耳光，最后，一群人在心满意足的对已经倒在地上呻吟的乡绅继续拳打脚踢，并且戏谑的当着他的面把所有的地契与借据烧得一干二净。

每烧毁一张借据或田契，人群中就会传出一阵发自内心的呼喊。

一个大规模的批斗会场景会令人振奋，因为集体的暴力行为会因为责任的分配而使施暴人感到心安理得，个人的暴力行为是一种对道德和法律的挑战，而群体的暴力行为则已经纳入了社会体系的范畴。

在某些地方，批斗会成为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戏剧表演，当批斗会的主席宣读控诉书时，一些积极分子会大声呼喊口号来调动围观者的积极性，在起诉书宣读完毕以后，早



湖南岳阳的农民在烧毁田契

北京郊区的翻身农民在批斗地主

已动员好的受害者会走上台来，涕泪交流的陈述自己所受的苦难，声嘶力竭的指着被批斗人的鼻子谩骂，用控诉的手指向天空，高声的叫喊着口号（一般是打倒……），直到周围人被这一狂热的舞蹈搅得热血沸腾。

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对这种农村大规模的批斗会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倾向于人们能够变现出自发的革命，共产党在革命中不过起到一个发起者和指导者的作用。

如果共产党发现火药桶只是安静的放在那里的话，他就会擦燃一根火柴。村民所组成的审判法庭就像批斗会一样，大多数地区没有分清楚批斗地主与镇压反革命分子，当农村的共产党的干部敲响村子中央，村民的心里所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开会了。

因而道德上的保守是运动最大的阻碍，但当地一个握紧暴力的拳头时，中国的传统道德就被打得粉碎了，在参加过这样一个振奋人心的批斗会以后，很少有人能安安稳稳的睡大觉，绝大多数人兴奋的辗转反侧，大脑里不断反复的播放白天的情景，到了第二天，就会有雪片一样的控诉书飞到农会干部的桌子上，这些控诉书的内容包罗万象，就像一位家庭主妇的帐簿一样，有些控诉甚至显得莫名其妙。

一位美国作家亲眼目睹了在一个村庄里所发生的农民运动，在一次批斗会上，一群农民将一个教堂的牧师拉出来批斗，一位农民大声指控他的欺骗行为，因为这名牧师告诉他不允许咬他发给这个人的圣饼，“谁要是咬了，圣饼就会淌血”，然而这名村民很显然从字面的意思理解了基督教隐喻的教义，某一天，这位天真的村民在教堂后面的厕所里品尝了圣饼的滋味，结果令这位害怕“上帝降罪”而惴惴不安的村民很快大失所望“里面尽是面，没见一滴血”。在这位受了骗的村民的带领下，人们揭发了这名牧师一百多条罪状，在批斗会还未开完的时候就对这名牧师饱以老拳，用特殊而快意的方式结束了这场令人兴奋的好戏。***

批斗的对象倒多是中国旧式的权威，而批斗会的实质就是打倒旧式的权威，即使从一些细节也可以看得出来：在中国旧式的衙门里，大堂上的衙役向雕像一样肃立两旁，而端坐在堂上的官员肃穆的神情与身后用于装饰的海上日出的屏风则更加透漏出权威性，肃静是使人感到压抑的绝佳方式之一，而压抑则是产生畏惧的条件，当主审官认为大堂上过于喧哗以至于自己的威严受到了损害时，他就会使劲的用桌子上一个长方形的小木头一惊堂木拍打桌子，发出巨大的声音以震慑围观的人群。

***有中国情结的威廉·韩丁在他的一本叫做《翻身》的长篇纪实小说中讲述了这个故事，这本小说记述了张庄的土改风貌，作为土改运动的亲历者，韩丁在这本书中的记述应当是真实无疑的。

而在农村自发的批斗会（审判会）上，只要你愿意参加就可以带上一个小马扎（一种折叠小方凳）来到会场，大多数人是站着，以便能够看清受审人的样子，当起诉书读到激奋的时候，人群里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就会响起，而且总是遗憾的压过了主审主席“请静一静”的近乎乞求的声音。喧闹使整个会场看上去就像某个巴黎的二流戏院或美国的地下酒吧。



缺乏权威性的批斗会使某些审判的结果近乎儿戏，在土地改革与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交叉进行的时候，与其他的运动一样，其结果大大的超出了共产党官僚机构的想象，尽管毛和他的同志一再指示不要草率行事和轻罪重判，但是，运动已经作为了一种习惯出现，而毛的带有计划性的指示又使这台挥舞着巨大镰刀的死亡收割机加足马力向前行驶。

“你们已杀了三千七百多，这很好，”毛给华南分局广东方面的负责人发去了表示赞扬和肯定的电报，并且鼓励他们说“再杀三四千人”然后，他给这些人定下了目标“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并且以缓和与犹豫的口气决定“看情况再定下一步的镇压计划。”

一位广西的农村支部书记在发现理应有十九个倒毙罪犯的刑场上居然出现了二十具尸体时，表现出来的不是恐慌与惊惧而是心不在焉，他甚至不去费心掩盖这件事情，而是拿过文件与表格，找到这个人的名字，漫不经心的画上一个已经枪决的符号。

当运动的本身不能作为一种需要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狂热心理，特别是人们发现已经很难再找出发泄狂热的对象时，运动就沦为了一场糟糕戏剧。

“地主”作为一项帽子可以随意的扣到任何人的头上，尽管，在1933年时，年轻的毛作为井冈山的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曾经为地主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

长着过长的脸和薄薄的嘴唇的康生习惯从眼睛框的上边看人，这位秘密警察大师在郝家坡为以后激进的农民运动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典型，他强迫因为行动不便而雇用长工的小脚寡妇和她年幼的儿子跪在瓦砾堆上，直到膝盖红肿磨破，然后找来一群激奋的群众充当演员往这对孤儿寡母的身上啐唾沫，一些典型的无业游民借机动手动脚，几个孩子用鞋底抽打跪在瓦砾上的“地主狗崽子”的脸。****

法国大革命后所造成的失落感显而易见，在罗伯斯皮尔

农民们在庆土改胜利的大会上高呼：“以实际行动，增加生产，报答毛主席的关怀。”

****1933年10月，毛写了《怎样划分农村阶级》一文，在地主一条中，毛是这样为地主的定义的：“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地主剥削的方式，主要是收取地租，此外或兼放债，或兼雇工，或兼营工商业。但对农民剥削地租是地主剥削的主要的方式。管公堂和收学租⁽¹⁾也是地租剥削的一类。

有些地主虽然已破产了，但破产之后仍不劳动，依靠欺骗、掠夺或亲友接济等方法为生，而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者，仍然算是地主。

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地主中特别凶恶者。富农中亦常有较小的土豪、劣绅。

帮助地主收租管家，依靠地主剥削农民为主要的的生活来源，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的一些人，应和地主一例看待。

依靠高利贷剥削为主要生活来源，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的人，称为高利贷者，应和地主一例看待。”

和他的狂热地刽子手的脑袋滚落在别的刽子手的脚下时，一大群革命的寡妇被有礼貌的请进了巴黎贫民区的几座破旧的小楼里，在潮湿阴暗的角落中像墙壁上的蜘蛛一样百无聊赖的编织着空虚陈旧的网，革命中的爆发户的画像从画框里射出黯淡的目光。而中国的革命为避免这种革命后的失落感而扩大革命对象的范围，冗长的证据搜寻过程会消磨斗志，大革命时期的民主法庭又被移植到了中国，无罪推定作为资本主义法权的一部分在社会主义国家被彻底打倒，憎恨和怀疑都可以作为证据。

在中国古代，一个奇特的传统被延续下来，当一个人被另一个人活活咬死后，那么这个凶手是不用付出任何代价的，中国的具有人情味的“法律”仿佛更注重意识而非法律本身。

这或许可以解释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农民赤手空拳的打死地主得以作为一种普遍而正常的现象存在，农村的精神生活正在发生不可思议的改变，一直被尊重的合情合理的权威依靠脉脉温情而长期存在，现在却被狂热的激情打翻在地。

尽管共产党本身反对各种各样的虐待行为，但是，当权力的魔杖掌握在农民的手中时，国家机器的力量便变得不值一提。

一种奇特的现象表现在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散布在乡村的党支部仿佛成为了一个游离于国家机器之外的独立机构，这些党支部和村里面的干部（同样也是共产党）组成了一套特殊的官僚体系，按照自己的轨道运转。

一位农村的新的干部向一位来访者滔滔不绝的描述着自己的运动经历，得意洋洋的像惊讶不已的来访者描述自己是怎样带领村民向村里面的富人发泄仇恨：“你要是想叫一个人坦白，只需要将铁棍放在火中烧”但是一些吝啬的女人，为了保护自己藏匿的金子而表现得非常顽固“她们宁死也不告诉你金子藏在哪里，她们不怕烧”。这一点正是共产党的官僚机构所极力加以排斥的。*****

然而在仇恨被调动起来以后，就很难再收束回去，打开了血腥的闸门，鲨鱼就不由自主地冲出来。

像所有在高级餐厅里享受完美食以后却发现口袋里空空如也的顾客一样，共产党的官僚机构不得不为这种尴尬的局面买单，充当那个刷盘子来偿还账单的角色，随着土地改革的进行，一批又一批的工作组作为指导被派往乡村，阻止一些过激的行为，同时也不分的代表了一种轻微的不信任：毛认为农村的干部已经被腐蚀得不可信任“只要两条烟就被收买了。”

毛和他的官僚机构作为导演的作用在最后成为了一台摄像机，作为一个旁观者的地位出现。

*****康生在郝家坡所进行的土改成为了暴力恐怖的典型，这位秘密警察头子从来不惧于死人，在他的指示下“无论有无罪恶一律进行肉体上的消灭”，根据记述，一个村庄在他未到之前，没有任何一个批斗对象死亡，而在他走后，有120余人被打死。

*****毛和他的同志实际上对农村的暴力行为采取的反对举动并未很好的执行，当农民的仇恨心理被调动起来时，熄灭仇恨之火就相当于熄灭了革命之火。

作为农民中的一员，毛并未亲身感受过地主的压榨与剥削，他反对地主对农民的虐待，却又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农民在批斗会上对地主所施加的种种暴力行为。

不过，在1947年大规模的土改运动中，毛仍然为土改中所发生的种种暴力行为而作了自我批评。却把大部分责任归结到了刘少奇的身上。

一个有趣的插曲增强了土改本身的戏剧性，而这个插曲的主角就是一名过去的演员：江青作为“毛的美丽的夫人”（赫鲁晓夫这样称赞她）屈尊纡贵的从中国古代帝王的居所——中国现在的权力中心中南海来到中国中部的湖北省武汉附近的一个农村去体验土改，为了不让这位上海的前影星过于造作的表演而败坏毛泽东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光辉形象，他只好化名为“李进”来参与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



这位娇贵的夫人很快发现自己身陷于看不见囹圄当中，囿于权威的畏惧，农民总是对她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而主管当地土改队的高级官员李先念却在对工作组层层分配的过程中在她的头上像叠罗汉一样的摞上了许多监督。

尽管毛曾经多次在北京的近郊近距离的接触农民，在竹子砍成的高高低低的篱笆墙里和农民唠家常，但是工作组的人却找出一大堆非常合理的理由防止她去观看农民的诉苦会和批斗地主。

江青最终还是作为一名旁观者参观了批斗恶霸地主和分浮财的表演，作为一名演员，江青试图在喧闹而热烈的斗争场景中寻找艺术的气息，她陪着诉苦会上声泪俱下的农民一起哽咽痛苦，可是当对恶霸地主的公开揪斗时，她却翻来覆去的在不断移动的人群中寻找艺术的火花，土改庆祝大会“过于兴奋”的人群把她吓得不轻，但是她却习惯于同样沸反盈天的锣鼓欢送会的场面，当所有村民对她表示依依惜别时，这位已经半老徐娘的过时演员仿佛有了走在红地毯上的感觉。

即使是作为戏剧的土改表演也不得不按一定的规则进行，1950年8月份公布《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基本上是1933年毛所发布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翻版，然而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北京越来越倾向于激进的土改方式而不是按部就班的调查与有序地进行，政治开始压倒经济，1951年在农村的革



嘉禾县土改时，农民对地主进行斗争

1952年3月，毛泽东在北京近郊德胜门外访问农民

命恐怖主义行为已经大大的超出了理性的范畴，对地主镇压的形式多样化也令人心悸，儿戏般的审判最终导致农民普遍的麻木心理，土改仿佛缺少了最基本的动力和源泉，当恐怖成为一种习惯时，其最终导致的结果不是热情的进一步加剧而是普遍的冷漠。

这种冷漠所表现出的现象可以从前面草率的死刑判决的案例中看出，而另外的一个案例则更说明了这场土改革命戏剧的逐渐谢幕，一位主管死刑复核的官员由于疲劳而将死刑犯的名单翻过了几页，这样一来导致了数十人的死里逃生，中国的一位地方史学者记录下了这件事，并且还在其它的地方史找到了相同的记述。

土改本身的恐怖主义行为作为一种戏剧而在 1952 年的年底谢幕，如果将消灭了一个盘踞中国两千年的阶级作为一个成就的话，那么这个成就远远的超出了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的普及所获得的成就，在此期间所采取的恐怖与暴力的手段尽管大大的超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官僚机构的估计，但是却并没有破坏农村平稳的生产增长——当然，这也可以作为在一个恢复中的中国的农业上的正常现象，当我们讨论这个初建的国家农业增长速度的快慢时，就会不由自主为自己提供一组想象中的合乎情理的数据。*****

中国从 1950—1952 年的农业增长似乎与其内在的生产方式的调整密切相关，但经过仔细的考察后发现，农业增长的主要原因却是来自于政治——一种安定平稳的政治秩序的建立，相比较来说，农民们由于耕种自己的土地而使自己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倒成为了一个次要的原因。

土改并没有比较明显的生产方式的改变，几百年前的中国农民的祖先们所使用的生产工具仍然握在他们的后代的手中，技术的改进微不足道，所消灭的只有套在农民身上的旧式的威权的笼头，农村的普遍贫穷仍然存在，但是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土地改革的目标已经完成。

“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不是单纯的救济穷苦的农民”中共的高级领导人之一刘少奇这样提醒充满良好的希望与火热的热情的农民，土地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中国的工业化，在这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里，共产党并不相信农业能使农民摆脱开长久的贫困境地，只有工业化，才能使“农民的贫困问题得到最终的解决”。

戏剧的作用是使人们能够暂时脱离现实而进入一个虚幻的、梦想的世界，戏剧本身过于完美，它能够说出人们心里面的最隐秘的希望，戏剧总有谢幕的时候。这并非是扫罗在前往大马士革中所看到的幻象，中国的农民不会因为一场戏剧而皈依某一种他们从未尝试过的理论或宗教，尽管戏剧和幻象一样的转瞬即逝。

*****除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1952 年，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宣告结束，从 1950—1952 年间，依照官方所提供的数据，中国大陆的农业总产量年平均增幅为 15%，其中 1952 年的增幅甚至比过去的 50 年中收成最好的年份 1936 年的产量还要高。

中国的土地改革本身的政治意义多于经济意义——从以后来看土地改革实际上将农民纳入了一个国家经济的体系之内——土改使农民普遍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改变了自己的地位与经济条件，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对这个政党充满了信心。

另外需要提到的是，土地作为一种财产的分配使农村妇女的地位有所提高，财产的所有权是人格独立的前提